

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王仙子 周之涵

摘要 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实质是“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历经起步学习期、探索发展期和走向深化期三个阶段。综括三十多年来从传播学层面研究孔子及《论语》的著述活动,大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研究方向:一是孔子及《论语》传播史实研究;二是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研究;三是当代新闻传播事业语境下孔子及《论语》的价值转换研究。准此,由改革开放以来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进程看,成绩和不足并存,学界应纠弊趋新,开创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之新局面。

关键词 孔子 《论语》 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 B222.2;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4)01-0085-09

作者:王仙子,女,1985年生,湖南张家界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播史;周之涵,男,1985年生,湖南怀化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台湾文学。厦门361005

一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传播学在中国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这三十多年来,国内传播学界对“传播学在中国”陆续展开了多个层面的研究,并进行了一些总结性的回顾^①。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引介、运用、推广甚至扎根,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不过,传播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却根植于西方,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舶来品”,因此如何将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化”通衢,遂成为自传播学引入之初便启动了一个问题。

中华文化是一种多民族融合,彼此取长补短,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积淀而成的文明。自汉以降,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通过秦王朝法理型思想的失败教训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定思想于一统之后,才真正从诸子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建构起华夏民族自身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符码和“图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明。而作为儒家文化和思想的代表,孔子及其经典语录体著述《论语》地位之崇高自不待言,以至于后人关于儒家的任何观点任何思想,孔子及《论语》是永远也不可能被绕开的人物和文献。在传播学领域,“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是当下摆在中国传播学者面前的热络议题,以传播学为契机切入孔子的传播活动及《论语》传播思想研究,当

^①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30年历史阶段考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6卷第5期。

然就更加避免不了对孔子及《论语》的阐释或新解。

改革开放以来,纵观中国传播学术界对孔子及《论语》的传播学研究,呈现出由起步学习(1978—1992)到探索发展(1993—2002)并不断走向深化(2003—2012)的趋势。综括这三个阶段三十多年来的著述活动,大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研究方向:一是孔子及《论语》传播史实研究;二是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研究;三是当代新闻传播事业语境下孔子及《论语》的价值转换研究。

二

1978—1992年是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起步学习期。1978年,“文革”结束,国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对外开放的路线,传播学在此时引入中国,并结合本土文化,掀起了一波“中国化”研究的浪潮。197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中国传播学研讨会最早提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口号。但此时正值“文革”结束,思想解冻刚刚开始,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刚被引入,学术界对其性质和定位并不十分明确,加上距离、政治等因素,“传播学研究中国化”并未在中国大陆引起重视。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继续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的方针,拟定了详细的学术规划,决定编纂一套《中国历史上传播理论与实践资料选辑》^①。自此,“传播学研究中国化”才开始走上系统化、有目的、有计划的研究轨道。

纵观1993年厦门会议之前“传播学研究中国化”以及在此范围内的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意识和明确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简单运用西方传播学观念处理中国本土文化的模仿和学习,且大多数是自发性研究,具体表现为总结性的多,深入研究的少;概括性的多,具体分析少;史料汇编的多,思想挖掘的少。

专著方面,有郭志坤的《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②,沙莲香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③,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④。单篇论文则很少,苑子熙、肖月的《中国古代的传播》^⑤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涉及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论文。另外,王振业《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传播思想》^⑥一文通过分析《论语》的社会功能,勾勒出古代社会的“工”字型传播网络。从这些为数不多的专著和论文看,它们所要解决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将孔子及《论语》这一本土文化资源冠以传播学之名,使传播学研究得以在中国化的视野下进行。另外,这一阶段的著述活动大多只是将孔子及其传播思想作为古代传播的某个部分予以简略梳理,偏重史料堆砌,疏于对孔子及《论语》所蕴含的传播思想的挖掘。

这一时期,有关孔子及《论语》的传播学研究成果虽不丰硕,但仍不乏立意高远之作。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部力作。该书提出了“人格修养”、“道德教化”等儒家传播观念,分析了人际交流过程中信息传播的技巧及意义。总的来看,这些梳理评述与此一时期其他著述一样,偏重史料方面的搜集整理,然而在该著的最后一章(综论:社会传播结构与传统文

① 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② 郭志坤《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沙莲香《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⑤ 苑子熙、肖月《中国古代的传播》载《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5年第5、6期。

⑥ 王振业《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传播思想》载《现代传播》1992年第3期。

化模式)中,作者以西方近代理性传播精神为理论预设,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种传播模式:同心圆型的“生命(生活)—传播结构”、枝干型的“社会—传播结构”和偏心圆型的“历史—传播结构”,认为相对于西方近代理性精神下的传播语境—“开放”、“沟通”和“扬弃”,中国社会传播结构和传统文化模式呈现出“封闭”、“集权”和“因袭”的负功能。作者将社会传播结构与传统文化模式安排在末章,不到万言,且有关孔子传播思想的评述仅有两页,这虽让读者稍感遗憾,但横跨中西的宏观视野使得该章规避了仅在文化地表作肤浅的机械收罗,而是深入到人类文明的肌理—探究究竟,为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思路。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自开始之际便立足于传播史实和传播思想层面,这也是后两个阶段研究的主题内容,只不过随着研究的推进,它们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不过这并不妨害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对史实而言,在任何时代、任何领域,对它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永远是一项事业得以展开的前提性条件。另外,这一时期传播思想研究成果虽然不多见,但一些研究对后来者的思维启发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陈力丹就针对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三

1993—2002年是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探索发展期。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同年春的邓小平南巡谈话促使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并波及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这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展开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社会语境。

1993年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成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转折点。会议一个直接的学术成果就是余也鲁、郑学檬主编的《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①的出版。该论文集有五篇涉及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的文章,其中吴予敏《从“礼治”到“法治”:传的观念》一文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解析儒家之“礼”,提出“礼治”的实质是社会成员通过交往将外在的“礼”内化为个体思维图式的过程,并用“以概念统驭传播”来概括儒家传播观。黄金贵《从“传”探索古代中国传播的类别与特征》一文则概括了古代传播的传播方式、传播渠道,得出儒家传播“一元性”的特点。陈亚兰《浅论先秦百家争鸣与文化大传播》一文将孔子及儒家传播置于文化传播的宏观背景之下,考察了其传播技巧和方式。郑学檬的论文《中国传统的传播观念初探》阐释了《论语》中潜在的认知观念,认为“儒家的认知观念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传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出儒家“垂直传播体系”一说。倪迅《试论中国人际传播的若干特点》总结了中国人际传播的八个特征,认为这些特征均可归结到儒家文化的“礼”和“忍”之下。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来看,他们对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实际应用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是实现“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必经之途,对促进传播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世界文化接轨有重要意义。

与第一阶段相比,此阶段的孔子及《论语》传播史实研究,专著及论文数量明显增多。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②一书中已有诸多内容直接涉及儒家传播,如作为传播媒

^① 余也鲁、郑学檬《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介的儒家礼仪,孔子开创的私学模式以及《论语》提出的“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学思行”等教育传播理念。此外,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史》^①,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②,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③,郑学檬的《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初编》^④,张卫中的《孔子:文化传播的先驱》^⑤等著作,均对儒家传播予以相当的关注。客观地说,这类有关孔子及《论语》传播史资料收集和整理的专著或论文仍是第一阶段学术思维的延续,详实的资料固然是研究的前提,但沉湎于史料爬梳的保守姿态或思维慵懒也是创新凝滞、深度消失的一个直接原因。

从总体看,在这一阶段中,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研究在经历了起步学习阶段的摸索后,终于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华夏传播”学科命名的尝试和“礼乐传播”观念的提出。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研究在经历了长时段量上的积累后,首次出现了“华夏传播”以及该范畴之下的“礼乐传播”等命名的尝试。“华夏传播”一词最早是由孙旭培在《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中提出,但为“华夏传播”划定学科范围、开掘思想资源等诸多繁复事项,则得力于黄星民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在其所发表的系列论文中,《“大众传播”广狭义辨》^⑥,打破了大众传播史以古登堡印刷机为划分界限的旧有观念,而将大众传播的历史大大拓展到“非机器媒介”时代。这样,以孔子及《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便被纳入大众传播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礼乐传播初探》^⑦从“5W”模式对儒家文化中的礼乐活动作了新的观察,以富有洞见的思维得出中国古老的礼乐活动因为“固定化的音调和程式化的仪式”表现出“高度的传播智慧与道德”。随后,《礼乐传播初探》的姊妹篇——《从礼乐传播看非语言大众传播形式的演化》^⑧以大众传播史为背景,追溯了大众传播中非语言符号传播形式的演化过程,并对礼乐传播作了宏观考察,指出“孔子修订、演习、解释、传授礼乐,把‘仁’、‘中庸’为核心的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与礼乐的形式成功结合起来,礼乐被改造成儒家的传播工具”,让我们对礼乐等非语言大众传播形式有了新的了解。2002年发表的《华夏传播研究刍议》^⑨一文开宗明义地对“华夏传播研究”出现的背景、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界定和体认,这篇极具学科建设性质的论文无疑对“传播学研究中国化”有着宣扬和号召的力量,代表了这一阶段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二是研究有了质的提高。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研究不仅是量的增加,更有质的飞跃,一些学术研究与生活省思相结合的文章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⑩可以看成是对吴予敏著作的接续。文章认为孔子的传播思想以伦理为基础,不无见地地提出这种传播思想的形成要以伦理的权力化和权力的伦理化为保障,并逐级确认了孔子“身→家→国→天下”的社会生活传播结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结合自身的

① 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④ 郑学檬《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初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张卫中《孔子:文化传播的先驱》,载《益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

⑥ 黄星民《“大众传播”广狭义辨》,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1期。

⑦ 黄星民《礼乐传播初探》,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⑧ 黄星民《从礼乐传播看非语言大众传播形式的演化》,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3期。

⑨ 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9卷第4期。

⑩ 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

人生阅历,汲取当时新颖的“实用理性主义”观念,一字、一词或一句,详细地揭示和阐发孔子传播思想的实用理性主义特征,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大历史观视野下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褒扬亦不贬损的客观评价和整体把握。

三是研究的热点区域凸现。由于《论语》文本内容的高度道德性、政治化特征,研究者很难将伦理与意识形态区别开来,造成的一个既成事实是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研究难以摆脱伦理与政治的藩篱,因此从伦理与政治言说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不绝如缕。王怡红在《论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的价值选择》^①中开篇点明中国古代社会人际传播具有社会伦理旨趣,反映在人际交往的性质、讯息以及意义的规范传播三个方面,而儒家之“礼”则渗透在传统社会人际交往之中,体现了人们道德价值诉求的规范。廖声武的《论先秦时期儒家的传播思想》^②、何庆良的《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③、高翔的《儒家传播思想的传者本位回归与超越》^④等论文也一致认为儒家传播思想的核心是“仁”,与政治联姻是儒家思想的传播实践,并指出儒家传播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社会统治。

四是研究方法的翻新。孙占奎在《孔子“诗教说”的传播学诠释》^⑤中以古代文论的“诗教说”为切入点,分析了“兴观群怨”在组织传播中的作用与功能。夏晓鸣的《儒道传播思想之比较》^⑥、刘亚玲的《论儒家与法家传播思想相通之处》^⑦等论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将诸子思想互参比勘,得出异同。

整体地看,这一阶段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无论在传播史料整理还是传播思想研究上都形成了迄今为止的最高峰,尤其是在传播思想研究方面的突破性成绩最为可贵。“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向各个层面展开,不仅在孔子及《论语》传播史料整理和汇编方面更系统,内容也更详实,从倡议学科建设、提出理论命名、采用新方法新观念等一系列现象来看,其所指是这个问题同中国当下传播生态结合、深化的必要。如当代以媒介技术为兴奋点的传播模式,往往囿于信息授受的多寡快慢,传播活动中本应聚焦的传播对人格的涵养意义却置若罔闻,这种传播活动相比讲究“仁”、“和”、“义”等价值倾向的儒家礼乐传播来说,简直就是舍本逐末、买椟还珠了。除此以外,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当代价值转换在这一阶段也开始初露端倪,如易法万在《儒家思想与现代新闻传播活动》^⑧一文中就分析了儒家文化的“内省修身”方式对构建现代新闻传播道德价值体系的意义。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为以后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开辟了另一个新领域。

四

2003年至今是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走向深化期。“传播学研究中国化”依托孔子及《论语》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不断走向深化,这些研究集中在中国文化传播理念和传播智慧的展现与弘扬,基本上是以今为主、以古为辅,致力于中国当代传播活动现象的分析和问题的解决,它们各有侧

① 王怡红《论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的价值选择》,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5期。

② 廖声武《论先秦时期儒家的传播思想》,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何庆良《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

④ 高翔《儒家传播思想的传者本位回归与超越》,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⑤ 孙占奎《孔子“诗教说”的传播学诠释》,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⑥ 夏晓鸣《儒道传播思想之比较》,载《企业导报》2000年第11期。

⑦ 刘亚玲《论儒家与法家传播思想相通之处》,载《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⑧ 易法万《儒家思想与现代新闻传播活动》,载《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重,互不排斥。

传播思想研究方面,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更加丰富、问题意识凸显、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和细化。

一方面,学术界不再满足于西方传统的传播学理论模式,开始尝试多样化的理论资源,另辟蹊径,借此拓展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容量。此时,“文化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话语”、“权力”、“符号”、“认同”等热门语词成为阐释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崔炼农《孔子思想的传播学诠释》^①一书突破以“仁”、“礼”作为孔子思想核心来讨论各基本范畴之间关系的习惯思路,采用话语分析方法,深入孔子思想各基本范畴的语义内部,发掘出孔子思想的深层逻辑。樊葵《先秦儒学传播控制思想刍论》^②认为掌控话语权是建构儒家传播控制思想的核心。雷大川之《权力即是情感:儒家政治社会化理念探析——兼论政治传播研究的新理路》^③运用认同理论,阐明了儒家礼乐文化中的“乐”在将社会价值观内化为人的主观情感过程中的方式与作用。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④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为理论基石,阐述了儒家对语言传播的高度重视,并以此证知语言在传统文化中的媒介权力作用。马腾的《孔子传播思想探析》^⑤对各种非语言符号的表意功能进行文化解读,进而提出“象、意统一的传播观”。仝冠军的《孔子传播思想研究》^⑥以《论语》文本为对象,着重论述了语言的遮蔽性、工具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等问题。陈谦的《从传播模式与功能理论看中国古代教化》^⑦汲取英尼斯“媒介偏向论”这一思想资源,探讨了中国古代教化传播究竟如何维持了时间与空间的平衡。胡河宁、孟海华、饶睿的《中国古代人际传播思想中的关系假设》^⑧强调“关系”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梳理了“仁”、“礼”、“忠恕”、“和为贵”等儒家思想在人际传播中作为“关系”的展开过程。

另一方面,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持续深化,“传播学研究中国化”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将西方传播学理论作为“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视为“体”,以“用”释“体”模式后,在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范围内出现了要求从中西文化更本源层次进行反思的“异音”。阳海洪在《“仁礼同构”:“5W”模式下儒家传播思想的问题意识》^⑨中一反全盘肯定的常态,重估儒家尤其是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的价值,认为儒家传播思想放弃了权力设计和求真目标,致使“中国民主、平等资源极为稀薄”以及“科学思维弱化与迷信权威意识盛行”。他还在《泛组织传播:对“孔孟”为中心的儒家传播思想考察》^⑩一文提出用西方传播学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模式简单套用以“孔孟”为中心的儒家传播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古代的传播活动,因为现代传播学是“西方现代理性精神的产物”,而中国古代传播“因个人

① 崔炼农《孔子思想的传播学诠释》,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樊葵《先秦儒学传播控制思想刍论》,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 雷大川《权力即是情感:儒家政治社会化理念探析——兼论政治传播研究的新理路》,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④ 陈谦《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载《东方论坛》2005年第4期。

⑤ 马腾《孔子传播思想探析》,载《东岳论丛》2005年第8期。

⑥ 仝冠军《孔子传播思想研究》,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⑦ 陈谦《从传播模式与功能理论看中国古代教化》,载《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⑧ 胡河宁、孟海华、饶睿《中国古代人际传播思想中的关系假设》,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3期。

⑨ 阳海洪《“仁礼同构”:“5W”模式下儒家传播思想的问题意识》,载《湘潭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⑩ 阳海洪《泛组织传播:对“孔孟”为中心的儒家传播思想考察》,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权利的法理缺乏,个体、组织无法形成与‘家国’相当的价值”,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泛组织传播”。李庆林之《论儒家的伦理传播观》^①辨析了儒家传播观是“明伦”而非“求真”,最终得出结论:这种传播观“是传统中国难以通过传播形成良性的知识生产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对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的研究还表现在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和细化,面面俱到、求全求大的思路转而开始向微观、专门化方向发展。例如,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从人际传播角度着手讨论的文章。覃凤云的《“君子”与“小人”:先秦儒家人际传播思想中的人格角色分类》^②将儒家作为人际传播的范例,区别了“君子”和“小人”两种不同的人格角色。张景云的《“五常”与儒家“慎言”传播思想》^③认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不仅是儒家道德的基本内容,也是规范人际传播的基本准则。卢峥的《从传播学角度看孔子思想》^④、毕琳、任欣的《儒家思想对人际传播活动的规范》^⑤、孙铭悦的《先秦儒家思想的人际传播》^⑥等文章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儒家思想中的人际传播。同时,由于孔子创办“私学”的人生经历以及《论语》浓郁的教化色彩,使得教育教化传播成为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研究的又一热门领域。杨小玲的《“君子”与儒家教化传播思想——〈论语〉的传播学解读》^⑦指出《论语》是中国古代较早阐述教化传播思想的重要文献,认为以孔子师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确立了教化传播的具体内涵和特征。高长岭的《兴观群怨——从传播学角度看孔子的诗歌教化思想》^⑧、赵伟、孙晓莹的《孔子教育传播思想与实践探析》^⑨、穆冠成、王丽雅的《浅析孔子教育传播思想》^⑩等文章也从文学、教育学等角度对这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

当代新闻传播事业语境下孔子及《论语》的价值转换研究在这一阶段表现得蔚为壮观,无论是量还是质,较前两个阶段都有了明显提高。

一方面,社会民生事业的进步催生了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业务的繁荣,这一局面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传媒市场化的结果,但离开理论指导这一重要推手显然不能自圆其说。例如,杨勇的《〈论语〉的传播思想对科教电视节目的启示》^⑪要求当今科教电视节目制作者重读《论语》,借孔子传播思想这一“好雨”达到科教电视节目“润物细无声”的功效。王建军、刘晖的《儒家传播思想与人文奥运关系的思考》^⑫结合2008年北京奥运会,认为儒家文化中“和谐”、“教化”等传播思想可以为“人文奥运”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另外,黄海、刘吉发的《儒家传播功能论的当代价值定位》^⑬、王明伟的《儒家“慎言”

① 李庆林《论儒家的伦理传播观》,载《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5期。

② 覃凤云《“君子”与“小人”:先秦儒家人际传播思想中的人格角色分类》,载《东南传播》2012年第2期。

③ 张景云《“五常”与儒家“慎言”传播思想》,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2期。

④ 卢峥《从传播学角度看孔子思想》,载《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⑤ 毕琳、任欣《儒家思想对人际传播活动的规范》,载《青年记者》2010年第35期。

⑥ 孙铭悦《先秦儒家思想的人际传播》,载《新闻世界》2010年第4期。

⑦ 杨小玲《“君子”与儒家教化传播思想——〈论语〉的传播学解读》,载《当代传播》2011年第3期。

⑧ 高长岭《兴观群怨——从传播学角度看孔子的诗歌教化思想》,载《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21期。

⑨ 赵伟、孙晓莹《孔子教育传播思想与实践探析》,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⑩ 穆冠成、王丽雅《浅析孔子教育传播思想》,载《管子学刊》2007年第2期。

⑪ 杨勇《〈论语〉的传播思想对科教电视节目的启示》,载《当代电视》2011年第5期。

⑫ 王建军、刘晖《儒家传播思想与人文奥运关系的思考》,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⑬ 黄海、刘吉发《儒家传播功能论的当代价值定位》,载《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传播思想及其当代意义》^①、陈新玲的《儒家传播思想与当代新闻传播》^②、陈燕、张文彦的《孔子的传播活动与传播思想探析》^③、陶雪玉的《儒家传播方式探析》^④等文章分别从儒家传播思想的某个或多个方面论述了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对大众传播媒介主导下的当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启示及意义。

另一方面,孔子及《论语》价值转换研究还表现在社会伦理层面上的叩问和探讨。在当代,西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道德败坏、经济危机、资源枯竭、恐怖主义等社会流弊已成众矢之的,因此,革除西方知识主义中主客二分这一传统痼疾,择用东方伦理主义中蕴涵的精神资源来诊治现代文明杂症,已成为当下人们的不二选择。毛峰的《回归道德主义:孔子文明传播思想论析》^⑤一文立足于孔子“道德主义”立场,认为《论语》中包含的“既保障传播自由又高度重视传播责任、传播道德与传播自律”之道德主义传播观是拯救“当代文明传播的失衡、异化、悖论与困境”的智慧泉源。另外,作者同年出版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⑥一书可以看作是前文的扩展。该书反思了西方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文明传播机制引发的自然生态和社会人文危机这一结构性问题,认为儒家思想是人类传播的道德核心,振臂高呼以儒家思想作为“今日世界沉迷物欲不可持久之种种危机的根本解药”。

相比前两个时期,孔子及《论语》传播学史实研究的著作及论文数量明显减少,但却呈现出更加自觉、针对性更强的特点。一些专门以孔子及《论语》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论文不断涌现,脱离此前只将孔子及《论语》作为一个章节、只求大求全不顾精细阐发的思维方法。除余志鸿的《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⑦仍旧将孔子传播思想作为古代传播思想史的一个部分予以论述以外,其他专著及论文均专门以孔子或《论语》为研究对象,如孔健的《阳光下的孔子:孔子与大众传播学》^⑧一书着眼于《论语》文本,对孔子的传播活动、传播经验、传者素质、传播主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杨尚鸿、唐晓红的《传播学视野下的孔子》^⑨将孔子的传播表达方式定位在“述而不作”,指出正是这样一种传播方式为中国文化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和巨大活力。另外,吉峰的《传播学视阈下孔子文学思想传播渠道建构蠡测》^⑩、左康华的《以私学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传播路径研究》^⑪、贾勤美的《原始儒学时期儒家伦理的传播途径研究》^⑫、王靖宇的《儒家思想的传播方式刍议》^⑬、陈岳芬的《从〈论语〉解读孔子的传播思想》^⑭等文章大体上从政治游说、编纂典集、兴办私学等方面专门论述了孔子传播活动的史实。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不断走向深化,在传播思想研究、当代价值转换和传播史实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比如在传播思想研究方面,虽然一些论点使我们认识到“传播学研究中国化”并非只是将西方理论

① 王明伟《儒家“慎言”传播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载《青年记者》2007年第22期。

② 陈新玲《儒家传播思想与当代新闻传播》,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③ 陈燕、张文彦《孔子的传播活动与传播思想探析》,载《齐鲁学刊》2003年第6期。

④ 陶雪玉《儒家传播方式探析》,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⑤ 毛峰《回归道德主义:孔子文明传播思想论析》,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⑥ 毛峰《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 余志鸿《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 孔健《阳光下的孔子:孔子与大众传播学》,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9年版。

⑨ 杨尚鸿、唐晓红《传播学视野下的孔子》,载《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9期。

⑩ 吉峰《传播学视阈下孔子文学思想传播渠道建构蠡测》,载《莆田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⑪ 左康华《以私学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传播路径研究》,载《东南传播》2011年第3期。

⑫ 贾勤美《原始儒学时期儒家伦理的传播途径研究》,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

⑬ 王靖宇《儒家思想的传播方式刍议》,载《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⑭ 陈岳芬《从〈论语〉解读孔子的传播思想》,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本土,但这种只破不立的学术态度却难以达到研究的深化,形成持续的理论推演,这与第二个阶段的学科化努力和思想性建设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再比如当代价值转换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往往只是将孔子及《论语》的传播思想与现实中的传播现象机械地凑合,缺乏理论建构能力和实践指导意义。

五

我们按照三个时段和三个主题的标准,从经、纬两个面向对新时期以来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立体透视。回顾这三十多年来,围绕“传播学研究中国化”,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首次将西方传播学大范围地具体化到中国本土文化场域,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方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绩彰著。

进入新世纪以来,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面临着一些新的课题。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新课题还未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比如2012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孔子学院事件”(注:美方拒绝为在美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续签签证)。我们知道,以孔子及《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精神向度表现为集体主义、道德意志、宗法、血缘,而西方文化传统则高蹈个人主义、知识理性、公共空间、契约。从整件事情的发展脉络来看,撇开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摩擦以及在合作上出现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等外在因素不谈,我们是否已经估测了儒家思想的精神向度被西方社会文化吸收和转化的可能性与程度?我们是否考虑过儒家思想在国外传播语境中会不会发生某种变异或误读,以至于由一种具有仁、义、礼、智、信等诸多普世价值的思想学说变质为外媒所指责的“文化殖民”或“文化渗透”?再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孔子及《论语》的存在状态、传播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的孔子及《论语》授受模式由学堂、高校、研究机构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的大众消费品,《论语》语录出现在题写的楹联中,编录在世界名人的箴言中,书画挂历内嵌入了孔子及《论语》,《论语》搭上了公交快车,登上了“百家讲坛”,走进了网络视频。显然,这已不是一个如何阐述孔子及《论语》章句,如何理解孔子及《论语》文本的问题了,而是如何满足新的受众、新的审美群体、新的接受期待,如何适应孔子及《论语》的生存环境,如何转变孔子及《论语》传播方式等种种问题了。这些现象和问题至少可以为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当代价值转换研究提供丰富鲜活的一手资料,但是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却显得异常迟钝,没有对此进行及时跟踪和恰当分析,这些都是今后的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